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

田庆立

(天津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摘要] 20世纪 80年代,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体现为如下战略意图: 从国家安全层面看, 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 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威胁的态势; 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 通过对中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 可以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 从情感因素方面考虑, 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负罪感”, 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进行某种补偿, 成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促动因素之一。总之, 对日本决策者而言,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日本; 对华合作; 安全战略; 经济利益; 情感因素

[中图分类号] D831.32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0.04.004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0)04-0027-(7)

[收稿日期] 2009-11-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行动选择研究”
(06JZD0023)

[作者简介] 田庆立(1975-), 男, 内蒙古赤峰人,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标志着两国正式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和平友好关系。自1979年大平首相访华后, 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 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 逐步确立起中日互惠合作体制, 出现了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蜜月时期”。20世纪80年代, 日本政界人士是如何认知中国的,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究竟包含哪些战略因素, 无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基于安全战略考量的对华合作

首先, 在20世纪70年代中苏对立冷战格局下, 日本通过选择与中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客观上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日、美、中联合对抗前苏联“扩张主义”的“统一战线”。尽管日本为避免过度刺激前苏联而疏于承认这一观点, 不容否认的是, 中国和日本之间之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维持一种稳定的“友好”关系, 遏制前苏联的过度扩张这一共同战略目标, 无疑起到了重要的“黏合剂”作用。日本、中国问题专家国分良成指出: “中美两国与日本将苏联视为共同的对抗目标, 实际上形成了战略性合作关系。后来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这成为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由。”^[1]

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 越南入侵柬埔寨, 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扩张态势, 西方阵营因

此而受到巨大冲击和强烈震撼。由于前苏联扩张的矛头直接指向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对广义上的日本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使日本在北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前苏联扩张的威胁感受到巨大压力。对此,大平内阁对日本的对外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日本政府谴责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特别强调了增进日美合作及日本与自由主义各国团结的必要性,决定对前苏联实施经济制裁,并增加对巴基斯坦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援助,以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日本政界人士认为,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代,日本的对外政策不能八面讨好,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日本必须首先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保持团结和协调,特别是坚持以日美安保体制为基轴的日美合作关系,防止中苏和解以造成“东西方平衡的大崩溃”,强调“日美欧加强对华合作”,“把中国拉进西方阵营中来”^[2]。20世纪80年代初,外务省的秘密报告指出:日本必须与西方国家统一对苏政策立场,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和措施遏制前苏联的扩张势头,并按照国家的实力平均分担与前苏联对抗的战略成本。^[3]

1980年5月,中国研究会发表了《中国备忘录》供议员们参考阅读,实际上是由中曾根康弘起草的,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其中对邓小平以后的时代做了预测和展望,关于中国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问题写道:“最近提出的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的问题,无疑是源自去年年初,中美合作以对苏战略为目标而发出的。日本处于中美两个军事强国之间而为‘脆弱的花朵’,将会成为中美两国安全上的重大障碍。”^[4]《中国备忘录》还对中日两国的不同国情进行了对比,认为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同时为防范前苏联,也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日本应该面向美国及太平洋和东南亚方面谋求发展,至于同大陆的关系,过度地参与和接近则很危险,通常应该审慎地加以推进。近来有关日中合作‘应进一步强化’的呼声日高,但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加强日中关系容易引起‘黄祸论’的误解。但是,从现实问题上来看,基于应对北方的考虑,目前中国的存在及其采取的政策,事关我方世

界政策推进上的重要因素,与之强化及维系永久友好亲善关系也是我国国策的基本方针之一。”^[4]

日本政界人士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不稳定容易导致政治动荡,引起路线变化,也可能“倒向苏联”;中国的实力如强一些,中苏关系便可“稳定”在“不战不和”、“长期对立”的状态。这样日本就可借中国钳制前苏联,抵住前苏联的威胁。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贷款,正是基于这种安全层面的战略考虑。

其次,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既可以确保中国的稳定,也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入反霸权条款,在各国看来,是日本选择了中国而非前苏联,日本政界人士的主流意图明显倾向于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合作,但决策的背景绝不仅仅是期望中国经济取得发展,而是有所谓的战略性判断。譬如,大平访华前,外务省首脑向其传达了如下讯息:“整体而言,华国锋—邓小平体制趋于稳固,但国内仍然存在反对其路线的人士。如果今后出现影响华国锋—邓小平体制稳定的问题,就可能给现代化计划的国家目标带来挫折。推进现代化的现实路线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来说,都是值得欢迎的政策。对我国来说,为使奉行现实路线的中国持续发展下去,应该继续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5]同时对大平访华的意义,外务省的内部文件中反复出现“确保中国的稳定发展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字样。

日本外务省驻华公使(时任)宫本雄二曾在文章中回顾当时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意图时指出:“日本认为中国通过现代化实现繁荣和发展对日本也有好处,积极协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助于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如此,日本还认为这有利于东亚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即基于‘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的出现会使世界更美好’的认识。”^[6]日本驻华大使馆目贺田周一郎公使认为,日本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此,日本希望通过 ODA 方式,与周边国家合作,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环境。而作为最大邻国的中国,其对外

开放和社会稳定,对日本自身发展大有裨益。“其理由不仅仅是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而且是为了维护日本自身的稳定与繁荣。”^[7]

日本政界人士加强对中国实施经济合作,主要基于政治判断,充分反映了日本的外交战略重点和对外政策走向。当时日本政界中居主流的观点是,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确保中国的安全稳定,为东亚稳定做贡献,与日本的国家利益一致,从而逐步引导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体系。日本一部分战略家认为,日本支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能够促使中国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这样,可以使中国“从力图打破现状的势力,转变为维持现状的势力。”^[8]大平正芳曾说:“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亿日元。”^[9]

最后,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具有将中国拉入西方阵营,防止中苏接近对西方形成威胁的战略目的。日本最担心中苏两国握手言和,认为那对日本的利益将是莫大的威胁。因此,日本试图通过与中国建交、缔约,拉住中国,尽可能使中苏两国的对抗状态持续下去。福田赳夫在中日缔约谈判恢复前访问美国时,就曾向美国总统卡特坦率地表达了这一意图。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看到中国继续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向西方开放的国家”。^[10]

1982年6月,铃木首相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又向美欧重申,“由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拉住了中国,才使得中国“面向西方”,这是日本对西方世界做出的“非军事性贡献”。外务省亚洲局长木内昭胤向一家杂志编辑部发表谈话时称,中日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使“中苏对立”,这对日本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幸运的”。^[11]

日本政界人士强化对华合作的实质是贯彻和落实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大国的地位趋于稳固,于是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以往单纯追随美国的路线,增强外交自主性,同时还能达到防止中苏接近的战略目的,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把开展对华合作列为外交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二、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对华合作

日本自1979年开始主要通过ODA的方式,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对此的认识是,通过密切与中国合作,贯彻“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确保能源渠道来源的多元化,通过务实地开展经贸往来,拓展中国市场,达到与欧美争夺中国市场的目的。^[12]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课题,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1978年末,外务省委托野村综合研究所就对华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并在野村研究所提交报告的基础上,撰写了《日中经济关系的长期展望》的文件。文件中强调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从中国进口能源和资源,日中经贸关系具有互补性,对日本的经济安全拥有重要战略意义,论证了日本对华提供ODA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3]

自民党内以总裁大平正芳为首的主流派对向中国提供ODA持积极态度。1979年1月19日,大平首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迄今为止,日中两国间的结算采取现金方式,今后如不调整信贷政策,大型项目就将难以推动。民间问题另当别论,政府打算以进出口银行和海外合作基金为后盾,推进大规模地对华经济合作。^[14]自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以注重对外协调为由主张“慎重”,但由于日中政治、经济关系较为密切,加之以大平为首的领导层积极做工作,使这种论调并未形成气候。落实日本对华ODA事宜的中方代表肖向前写道:“中日关系在1979年又有了新发

展。……中国在此以前强调自力更生,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还未谈到从国外借款。但是大平任首相后首先想到利用政府开发援助贷款(ODA)帮助中国、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这恰好是中国的需要。所以日本政府一提出,中国即予以了响应。”^[15]

1978年,中日双方签订了总额达 200~300 亿美元的长期贸易合同,商定中国向日本出口 1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其中石油 4 710万吨、煤炭 845~920万吨。^[16]通产省通商政策局局长矢野俊比古评论说:“考虑到现在的日中关系和日本的国际环境,这当然有助于确保能源和资源供应的安全,同时也有利于资源和能源市场的多元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成套设备出口的广阔市场。”^[16]从确保能源供应和拓展海外市场的角度,指出了进口中国能源所具有的经济安全意义和扩大出口市场的作用。经团联能源政策委员会委员长松根宗一也认为:“如果能在 4 5年内按协定进口中国石油,……日本整个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一将从亚洲石油解决。如此,日本则无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口能源),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确保安全。”^[17]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角度论证了与中国进行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小竹一彰在分析日本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因时指出:“日本总结了战前采取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教训,认为这种作法对国际市场的缩小有不可回避的责任。进而认为如果现在以日本的经济实力为背景,与中国发展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对日本是有利的。”^[8]

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的合作,最显著的业绩就是自 1979年至 1986年的贷款记录,7年间共提供总额达 34亿美元(按 1986年的汇率计算)的长期政府信用贷款,而且返还条件比较优惠,每当中国出现财政危机,甚或重点项目出现问题时,日本都会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加以响应。^[18]如果再加上由日本进出口银行及商业银行提供的短期信用贷款,中国可利用的信用额度则达 200亿美元。这些贷款无疑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发生了浓厚

兴趣。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横山宏章认为,日本与中国加强合作包含着经济目的,“毋庸赘言,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市场,对日本来说具有潜在的魅力。同时,如果邻居发生经济混乱,大批流民和难民涌入日本,日本的经济也会出现混乱。显然,最为关键的是,为保持中国实现有条不紊地经济运转,同中国进行合作,对日本经济的稳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19]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普遍认识是,在经济建设上同中国积极合作,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就意味着亚洲的稳定,加之中美关系好转,会促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20]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界在对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上进行反省的同时,也对天然资源的供给源和长期来看拥有无限魅力的中国市场寄予了很大希望。这些基于对外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成为推动日本政界人士积极加强对华合作的重要动因。^[21]

三、基于情感因素考量的对华合作

1972年 8月,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当时日本舆论纷纷赞扬中国政府 and 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表示: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宽宏大量,要真诚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中日联合声明》表达了两国不愿让过去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的决心,它的象征便是“日中友好”的大原则。对于日本方面来说,中国方面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虽是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前提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同时也使日本人有了一定的潜在的负罪感,从而成为包括日元贷款在内的对华经济合作的推进剂。^[1]

在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之际,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知恩图报”的氛围。日本经济界领袖人物、新日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建议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低息长期贷款时,也提出中方没有要日本的战争赔偿,应以此作为一种补偿。外务省官员也承认:对华 ODA 的提供以及日元贷款的优惠程度

较高，都带有对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宽宏大量给予回报的性质和意义。^[22]通产省最先提出对华日元贷款设想，对落实该方案也最积极。其理由是：第一，主张以日元贷款促进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和从中国进口能源资源；第二，主张“对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中国政府积极提供经济合作”。^[23]曾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宇都宫德马曾说过：“如果要日本拿出 500 亿美元的赔款，即使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看，也需要 50 年才能付清，那样将肯定阻碍日本经济发展，也不会有日本的今天。这一点不应忘记。新中国之所以放弃赔款要求，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珍视中日友好，诚心诚意希望子孙后代友好下去。”^[24]与此同时，《读卖新闻》也撰文称，“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支付了战争赔偿，承担了道义责任，而中国遭遇极大的灾难却放弃了赔偿，所以讨论援助数额时不应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相提并论。”^[25]1983 年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二批日元贷款时，社会党议员小林进认为：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角度考虑，日本应该继续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农业资金援助。^[26]日本学者认为：“历史的负债”成为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以及对华提供 ODA 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27]由此可见，日本的政界人士、财界人士及媒体和部分民众确实抱有对华日元贷款与战争赔偿相关联的意愿。

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曾经指出：“最近某份报纸报道，园田直外相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针对中国放弃赔偿请求，日本方面如何应对时表示，‘对于中国现在正迫切实施的现代化政策，我国应付诸诚意予以合作至为重要’，这一报道强烈地体现出的意味在于，对中国推进现代化进行合作，不仅停留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在精神层面，也凝聚着支付赔偿的意义，我认为园田外相的这一发言也表达了全体国民的心愿。”^[28]宫泽喜一在谈到中日关系时表示：“不久以前的日中战争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麻烦，战后就是在持有这种心情的基础上恢复邦交的。当时中国方面表示不向日本请求赔偿，确实是做出的重大决断。……日中经济合作之所以以巨大规模得以推进，就是在充分考虑到过去的各种经历的

基础上实施的，而且也确实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挥了作用。”^[29]

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时，日本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大多数人中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即“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因此日本也应该进行经济合作”。某位日本官僚在接受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的采访时就明确地表示：“我们对中国怀有歉疚。由于我们给中国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必须对他们进行援助。”^[18]

尽管日本各界人士在有关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提供对华援助具有密切关系上存在共识，但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的一贯主张是，日本提供的对华经济合作，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没有关系。1979 年，大平首相在国会答辩时明确否定了经济合作与历史反省相关联的问题。^[30]对此，社会党议员板川正吾提出了如下质询：“日本国民曾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犯下的非人道的滔天罪行，作为某种反省，难道不应该对中国实施特别的经济合作吗？”大平表示：“从心情上来说，并不是不理解板川的意图”，但“事实并非如此”。继而大平指出：“有关赔偿问题，中国已作出决定不要求赔偿。因此，赔偿问题已经获得了最终解决。因此，那种立足于赔偿或转变为赔偿的想法来考虑中日关系并不正确，我想那也不是中国的本意，今后的中日关系应该遵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原则锐意进取。”^[30]

外务省官员也反对将对华日元贷款视为对华战争赔款的替代物。前驻美大使松永信雄认为：“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决定不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一事，带给所有日本人民的，不仅是对两位领导、而且也是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和敬意。这件事跟日本对华经济合作在法理上没有关系。但在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合作的时候，我们总是考虑到中国的这一决定。”^[31]一方面承认中国放弃索赔与日本对华 ODA 的决策并非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又否认两者之间在法理上的联系。

当时日本政界人士的普遍认识是，尽管拥有对历史的反省和对中国的感谢情绪，但在现实上

似宜采取与之剥离的经济合作的物质补偿方式,或通过法律手续等来处理。这和中国以对历史的反省为前提的思考方式迥然有异,对此后的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

中国学者朱凤岚认为,“中日两国对 ODA 与战争赔偿之所以曾经存在过‘暧昧认识’,是由于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认为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的中国有所回报,而普通中国国民也存在希望得到日本友善回应的心理。这才导致双方在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上产生了些‘默契’。这种‘默契’如没有外力的催化,还有可能存在于某个层面,但一旦遇到外力冲击,就会转化成一种反作用力。那些正在寻机逃避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负疚感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学者和媒体正是利用了中方的明确表态才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32]无论从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识中,还是当时日本国民对侵华战争中的“负罪感”来说,日本对华合作中无疑包含着这种情感因素,只是日本政府基于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才未予确认。这种中日双方心照不宣的共识,是推动日本政界人士做出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对华合作决策的因变量之一。

日本对华 ODA 援助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根据 1993 年的资料,日元贷款在同期中国经济领域新建项目中的资金比重分别为:电气化铁路干线的 25%,万吨级轮船泊位的 13%,光纤通信电缆的 16%,发电装机容量的 11%,化肥生产的 56.5%。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从 1985 年的 1.54%,提高到 1992 年的 10.41%。另外,据截至 1998 年 3 月末的统计,利用日元贷款正在建设或已经完成的项目中,占全国电气化铁路的 35.4% (4 600 公里)、轮船泊位的 12.8% (60 个)、污水处理能力的 36.4% (日处理量 400 万吨)。^[33]

总之,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合作认知主要是基于安全、经济及情感等因素的考量而形成,日本开展的对华合作,大体体现如下战略意图:从国家安全层面看,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

威胁的态势。同时,保证中国稳定,可以减缓来自以往共产主义中国大陆进行围堵和盯防的压力,而且通过密切交流和接触,引导中国向民主主义制度方向发展;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通过对中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可以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从情感因素方面考虑,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负罪感”,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进行某种补偿,成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促动因素之一。对日本决策者而言,日本开展对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 [1] [日]国分良成. “1972 年体制”的变化与发展协调关系之路 [J]. 日本学刊, 1997 (5): 45-45
- [2] 新华社东京电讯 [Z]. 1981-06-11
- [3] 李勇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 (苏联)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 [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1: 37
- [4] [日]中曾根康弘. 天地有情 [M]. 东京: 文艺春秋社, 1997: 328-330
- [5] [日]朝日新闻 [N]. 1979-11-21
- [6] [日]宫本雄二. 对华经济援助今后怎么办 [J]. 外交论坛, 2000 (8).
- [7] 胡令远. 试论中日关系的新向度 [J]. 东北亚论坛, 2008 (6): 6
- [8] [日]安藤正士, 小竹一彰. 原典中国现代史 (第 8 卷) [M]. 东京: 岩波书店, 1994: 198-154
- [9] [日]大来佐武郎. 经济学家外相的 252 天 [M]. 东京: 东洋经济新闻社, 1980: 159
- [10] 吴学文. 当代中日关系 (1945~1994)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5: 320
- [11] 王新堂. 从血仇到友邻 [D].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 1997: 209
- [12] 尹晓亮. 日本构筑能源安全的政策选择及其取向 [J]. 现代日本经济, 2008 (2): 20-25
- [13] [日]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 日中经济关系的长期展望 [J]. 世界经济研究, 1979 (11): 36
- [14] 人民日报 [N]. 1979-01-23
- [15] 王殊, 肖向前. 不寻常的谈判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287
- [16] [日]小岛末夫. 对中国现代化的重新调整与日中关系 [J]. 世界经济评论, 1980 (3): 49-49
- [17] 林晓光.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M]. 北京: 世界知

- 识出版社, 2003: 220
- [18] [美] 艾伦 S 怀廷. 中国人的日本观 [M]. 冈部达味译, 东京: 岩波书店, 2000: 191, 194.
- [19] [日] 横山宏章. 日中的障碍 [M]. 京都: 塞马尔出版会, 1994: 6.
- [20] [日] 增田宏, 波多野澄雄. 亚洲中的日本与中国——友好与摩擦的现代史 [M]. 东京: 山川出版社, 1995: 229
- [21] 田庆立, 程永明. 日本外交中的机会主义与对华行动的选择 [J]. 东北亚论坛, 2008 (6).
- [22] [日] 朝日新闻, 1998-11-05
- [23] 金熙德. 中日关系——复交 30 周年的思考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136.
- [24] 刘守序. 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 [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68
- [25] [日] 读卖新闻 [N]. 1979-12-04
- [26] [日] 第 98 届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录 (第 16 号) [Z]. 1983-03-03
- [27] [日] 猪口孝. 现代国际政治与日本 [M]. 东京: 筑摩书房, 1991: 179 [M].
- [28] [日] 冈崎嘉平太. 我的记录——飞雪迎春到 [M]. 东京: 东方书店, 1979: 214
- [29] [日] 宫泽喜一. 新护宪宣言 [M]. 东京: 朝日新闻社, 1995: 192-193
- [30] [日] 第 87 届国会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会议录 (第 9 号) [Z]. 1979-04-11
- [31] [日] 宫本雄二. 当前的中日关系及展望 [J]. 中日关系史研究, 1998 (2).
- [32] 朱凤岚. 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 [J]. 当代亚太, 2004 (12): 12
- [33] [日] 日本驻华大使馆.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Z]. 1993

[责任编辑 富燕妮]

An Analysis on the Strategic Factors That Japan Developed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IAN Qing-li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Japan's strategic intentions in develop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re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security, taken an activ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ould effectively contain and counter the expansion of Soviet Union. Based on the economy strategy, by providing capital and technology, Japan could insure the diversity of its resources and enter into China's market that had limitless potential. Thinking from emotion factors, Japanese politicians generally had sense of guilty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some compensation in the way of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became the main push factors that made Japan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brief, for Japanese policy makers, developing cooperation with China was the important part in carrying out its integration security and safeguard strategy.

Key Words Japa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security strategy; economic interest; emotion factors